

乡村现代设计的历史脉络与动态观照

张嘉欣,梅芷悦

(长沙理工大学设计艺术学院,湖南 长沙 410114)

摘要:中国乡村现代设计的进程,经历了中西设计意识的碰撞与调和、全球化与地方化的价值对立,再到地区城乡关系差异下的自我身份书写这一艰难过程,可以说中国乡村的现代设计自始至终所呈现出的是一种流动的現代性意识,且这种現代性意识是与中国乡村设计实践活动相伴相生的。通过梳理乡村现代设计的历史脉络,可以从中窥探中国设计現代性意识的生发逻辑,并透过时间脉络中的设计变革来更好地理解与把握乡村设计。

关键词:乡村设计;現代性;現代化;地方化;设计伦理

中图分类号:J02

文献标志码:A

引用格式:张嘉欣,梅芷悦.乡村现代设计的历史脉络与动态观照[J].沈阳建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6(1):27-33.

回顾历史,随着西方现代设计话语的进入,中国设计也开始了“现代转型”,社会的现代化加速了现代设计的发展,同时,现代设计也成为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必不可少的推动力。中国设计的进步,绝不仅仅是学科内部“范式”的变革,而恰恰是一种与中国现代化过程息息相关甚至融为一体的变革现象。在此过程中,可以看到目前深入中国乡村地域中的现代设计,逐步具备了和传统设计完全不同的特征。在与城市相对应的乡村中,现代设计被打上了植入型而非原生型的标签,导致中国乡村设计中的裂痕呈现出“新旧”与“中西”的双重冲突。目前学界针对乡村设计的考量视野大多停留在功能性层面,对设计意识生发的現代性逻辑缺乏细致地甄别和探究。因此,梳理中国乡村设计发展的历史脉络,并从中探寻设计发展的内在过程以及从变革的逻辑中思考设计的現代性,不仅

是对不断变化着的乡村设计现实的体认,也是对乡村设计未来的展望。

一、乡村设计現代性的萌芽:西学东渐与中西调和

1. 西学东渐

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国外乡村设计开始由边缘化的研究位置逐渐转为学界和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无论是城市设计研究方向的改变还是专业化、职业化的乡村设计兴起,都共同关注现代语境下乡村如何发展、更新以及新的乡村聚落环境营造问题。早在工艺美术运动(The Arts & Crafts Movement)伊始,设计师便开始关注传统技艺,从乡土民间汲取设计灵感,包括对乡土材料的运用、对形式神韵的理解控制以及对功能的生活化表达等来使设计作品多元化。之后,“乡土主义”(Vernacularism)开展了对乡土建筑的集中研

收稿日期:2023-10-08

基金项目:2023年度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一般课题(XSP2023YSZ013);长沙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2023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2023CSSKKT128)

作者简介:张嘉欣(1991—),女,湖南常德人,博士。

究,对乡村地区建筑的历史、形式、空间以及结构、工艺等进行记录和梳理,致力于从传统的乡村建筑中吸收经验,然后将其运用到现代设计之中。继“乡土主义”之后,美国建筑历史学家肯尼斯·弗兰普顿(Kenneth Frampton)在《批判的地域主义》中提出了“新乡土主义”(New Vernacularism)。“新乡土主义”带有深刻的还原主义倾向,不仅在设计中强调回归自然的生态伦理观念,同时也强调对地方特色和民俗习惯的保留。此外,“地域主义”(Regionalism)的出现同样与乡村地方文化联系紧密,从关注物质感受扩散到抽象的精神感受,所还原的场所精神不是个人的具体回忆,而是乡村所共有的“集体记忆”。继“地域主义”设计思潮之后,以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亚历山大·佐尼斯(Alexander Tzonis)、克里斯蒂安·诺伯格-舒尔茨(Christian Norberg-Schulz)、肯尼斯·弗兰普顿为代表的理论家从陌生化、建构理论、场所精神等典型的设计理论出发开展了“批判地域主义”(Critical Regionalism)的研究^[1]。设计领域的“批判地域主义”是一种辩证开放的思想,在抵抗现代性背景下的设计风格同化的过程中,“批判地域主义”强调了现代与传统、场所与精神等地域环境中的文化内涵,既承认现代生活和技术发展,又辩证地对待设计中的地方性。

总体来看,国外关于乡村设计的理论与原则包含了两个过程:一是自下而上在地方性历史文化根源中找寻设计表达的形式;二是辩证地看待地方性,并不排斥现代性,在延续地域文脉的同时创造一种适应时代发展的设计文化。在参考和借鉴国外乡村设计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中国的乡村设计建构了自身的理论体系。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涌现出众多关于乡村社区营造、乡村自组织建设、乡土地域主义、批判地域主义以及自反性地域主义的理论文献,同时在具体的设计工作中,国内高校团队和优秀设计师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将研究重点落脚于“西学”的本土化转型^[2]。例如,以同济大学建筑学院

为代表的高校团队,长期组织和开展乡村设计国际交流活动,并坚持师生“设计下乡”,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与乌岩头村、十四都村、龙峰村等多地合作的教学科研平台,切实从乡村情境出发,探索适用于中国国情的乡村理论与实操体系。而国内优秀的建筑设计师,以王澍的富阳洞桥镇文村民居(见图1)、谢英俊的西藏纳木错牧民安居、崔愷的西滨村昆曲学社(见图2)等设计项目为代表,通过将现代建造技术与乡村传统营建技术相结合,以及对乡土地域文化进行西方设计语言的现代转译,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乡村设计案例。



图1 王澍设计的富阳洞桥镇文村民居



图2 崔愷设计的西滨村昆曲学社

2. 中西调和

19世纪40年代以来,以建筑为代表的中国传统设计受到了西方现代设计在结构、技术和形式等诸多方面的影响,从而逐渐与传统营造方式分道扬镳。中国设计先驱在西方设计观念的熏陶下,不断突破传统设计的界限,围绕着“美术与工艺”“工艺与产业化”等问题,经历了一段反复摸索的时期。在设计西学东渐初期,全新的设计观念在技术的支撑下不断被推出,从整体来看,设计朝着

“统一科学”的方向前进^[3]。虽然中国设计在全面西化过程中经历了不同设计思潮的相互碰撞,但依然在以工业化发展为依托的背景下实现了中国现代设计的“华丽转身”。其中主要有两个方面值得关注:

一方面是中国现代设计在经历中西调和过程初期所展现出来的功能主义倾向。西方现代主义设计运动中最重要的设计理念,便是对功能性的推崇。从社会历史背景来看,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复兴无疑为现代设计转型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但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现代设计在物质生活的表现上是微弱的^[4]。国内设计先驱对功能主义的关注无疑是历史的选择,将视野转向广大乡村,全面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部分乡村的居住条件有所改善,这一时期的村镇规划和建筑设计都追求设计的“多功能性”。受到亚洲其他国家乡村改革实践的影响,尤其是日本市、町、村“明治大合并”的影响,中国乡村规划开始朝着强调组织化、集体化的功能型规划模式发展。从1979年到1984年的短短6年,乡村建房就已经超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30年乡村建房的总和。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户的住房逐渐更新了传统的建筑结构,在有限的经济条件下乡村设计从各个方面表现出对功能性的诉求。无论是建筑用房、基础设施、农机产品还是食品包装的造型设计都没有过多的考究,而是将主要设计力量集中于对基本功能的诉求。

另一方面是中国现代设计在经历中西调和过程后期所展现出来的形式主义倾向。现代设计之父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曾直言:不要在家中放一件虽然有用但并不美的东西。以历史的眼光来看,中国改革开放后现代化建设目标明确,城乡之间的差距也在城镇化过程中逐渐缩短。当基本的物质需求得到满足后,乡村民众的精神需求与日俱增,此时的乡村设计开始从文化、审美等方面强化对设计的要求。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山西平定县南岭乡、西锁簧乡集资修建了样式新颖、设备齐全的中学,江苏碧溪乡修建

了青瓦白墙、颇具苏州园林风貌的文化活动中心^[5],以及江浙一带集镇新村的风貌更新设计(见图3、图4),都体现了乡村设计由单一的功能性追求转向形式美感的追求。但由于中国乡村工业的薄弱,新材料、新工艺的产出和使用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这使现代设计在乡村的全面推进受到了阻碍。加之乡村民众对“物”的态度和追求逐渐脱离过往麻木和压抑的状态,迫切寻找和模仿符合“现代”的设计形式和生活方式,如此一来,在营造乡村设计的现代氛围时,设计师们难免纷纷转向对外观形式的过分追求,并以此作为快速而有效的乡村设计解决方案。



图3 浙江舟山岛上新建的渔民新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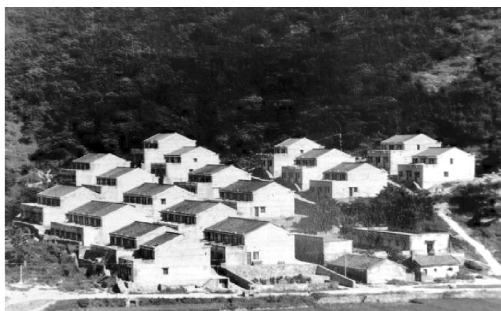


图4 浙江萧山区红山新村外景

由此可见,中国乡村设计西学东渐的过程,是基于西方设计思潮关于“地域”和“乡土”的众多“主义”“运动”的理论基础,由部分高校团队和精英设计师引领的国内乡村设计图景的“现代”转译。而中西调和的过程,则主要受到西方设计思潮中功能主义与形式主义的双重影响,并在乡村具体的发展现实中生成了“特色”的设计表达方式。

二、设计行动的现代性:从全球化到地方化

1. 全球化作为世界范围的知识语境

全球化是一个内在充满矛盾的过程,既有单一化,又有多样化;既是国际化,又是地方化^[6]。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7](Anthony Giddens)认为,全球化的本质就是流动的現代性,随着人类社会现代化、信息化进程的加快,全球化势必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并将在各个领域解构甚至重构世界各地所固有的文化构成。全球化传播中的流行和同质化问题,切实困扰了人们。1992年,美国著名后现代主义批评家弗里德里克·詹明信(Fredric Jameson)与他的学生迈克尔·斯皮克斯(Michael Speaks)进行了一次关于建筑与空间的谈话——《包裹物和飞地:后市民社会的空间》(*Envelopes and Enclaves: the Space of Post-Civil Society*)。在谈话中,詹明信一开始就谈到了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同质空间中,设计师该怎样面对及其究竟能做什么。全球化或者更加全面的现代化意味着要消灭代表着历史差异的不同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将一切事物标准化和同质化,这也意味着全球化成为了世界范围的知识语境。在这个意义上,乡村设计的发展难以回避追求现代主义目标所带来的困境,且从中国的乡村设计实践来看,全球化的设计知识流动为乡村环境带来了新的机遇,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将其卷入设计同质化、一体化甚至一元化的情境^[8]。

2. 全球化背景下乡村地方性的风险问题

在基于全球化背景的设计活动中,城市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现代性的机器和主角,乡村等地方性感知逐渐被弱化,乡村的空间形态、生活方式、精神文化都在全球化背景下经历着一个不断解构与重构的过程^[9]。现实中,设计全球化所简化的地方性设计文化比它所创造的新文化要多得多,伊丽莎白·滕斯托尔(Elizabeth Tunstall)教授在《为社会影响而设计行动指南》(*Design for Social Impact how-to Guide*)中就一针见血地指出:

“新的知识分类系统正在不断创造‘理性’,并透过一系列的文字和图像表征在全球范围内迅速传播开来。”但在追求全球化的设计活动中,“国际化”有时不仅不能让中国设计得到世界的认可,反而在模糊的设计边界中使自身文化的历史性与稳定性遭到了破坏。阮仪三教授曾撰文指出,20世纪80年代前后,江南一带还保存着50多个像周庄那样的古镇,但随着城市化的粗放式开发,这些古镇先后被破坏,“全球化”“城市化”成为城镇文化遭受破坏的“罪魁祸首”^[10]。如此看来,既可以认为设计的全球化是一种可以给全人类带来利好的创造性活动,同时也不能否认这种创造性活动对地方性造成的巨大破坏。

乡村设计常常表现出同质性与异质性相互碰撞摩擦的特点,在地区性的抵抗意义上,作为“边缘地区”的乡村,显然可以成为这种全球化抵抗性理论与实践的主角。但正是由于乡村地区有着与城市对比鲜明的异质性、矛盾性和冲突性,故在全球化过程中可以被当成对抗现代与后现代空间入侵的最后领地。如此一来,乡村设计在塑造乡村现代生活的过程中,其一直被忽略的抵抗、分裂、融合的抵消性设计力量,也可以成为化解当前全球化风险问题的关键。

3. 地方化抵抗全球化的乡村设计伦理意识复苏

工业文明的语境,使地区原有的多样性受到以西方国家作为话语中心的设计价值观的巨大冲击,并表现在地区与地区之间的边界日益模糊,尤其是在大众文化特征下,乡村地域性风格不断弱化,视觉景象也不断被同化。此时,乡村设计无论从被动性还是从自觉性来看都开始具备一种抵抗性的特征。表面上看,乡村设计所抵抗的是一种“普遍性”的设计价值观,与之相对应的是“世界性”的观念。究其实质,正如苏哈·奥兹坎(Suha Ozkan)在《现代主义中的地区主义》中所说的那样,“大多数持地区主义观点的建筑师所反对的不是现代主义,而是国际主义”。

设计全球化的风险问题无疑带来了一种

边缘性,乡村设计作为重要的边缘层,逐渐在自我身份的价值认同与文化自觉中生发出抵御全球化的力量,这种力量如何对话现代设计的中心与边缘,如何边提供可识别性的文化边小心翼翼地吸收全球性的技术,越来越成为人们所关注的话题。阿基莱·伯尼托·奥利瓦曾用“Global”和“Local”组成了一个新词“Glocal”(全球地域性),表达的是一种在全球化与地区化之间的中立、混杂的态度,全球化与地方化设计的核心思想可理解为“全球化的思考、地方性的行动”。而当下中国乡村设计意识的复苏,经历了全球化与地方化的价值对立、再到地方化的自我身份书写的艰难过程。

三、设计现代性矛盾的加剧:从中心到边缘

1. 城乡之间的“依附”关系

雷蒙·威廉斯^[11](Raymond Williams)在《乡村与城市》中明确指出了城市与乡村同时存在于现代社会、经济、文化以及政治等现代环境内部诸多危机的总体性发展过程中,这也意味着城市与乡村并非两个完全独立的概念,二者是紧密相连的。自20世纪20年代起,从“新村运动”到“乡村建设”,乡村发展的总体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要对中国广大乡村进行彻底改造,以契合时代发展的步伐。城镇化的发展有利于促进农村的基础建设,这为乡村转型奠定了良好基础^[12]。从城市流向乡村的规划、建筑、景观等设计实践活动是伴随着城镇化脚步而发展的,总体发展曲线呈直线上升趋势,但不平衡的城镇化也着实带来了诸多问题。总体来看,城市与乡村在城镇化进程中所爆发的空间矛盾直接影响着中国乡村设计的进程,换言之,有关中国乡村设计现代性的发生路径也可以从中国城镇化进程中读取。

2. 设计陈述的偏见

杜威·索尔贝克(Dewey Thorbeck)曾一针见血地在 *Rural Design: A New Design Discipline* 一书中提到,虽然乡村设计和研究

都融入了文化、社会、经济以及环境等不同学科视角的研究观点,但大多数回应却都是基于城市视角的。当前,城乡不平衡的地理关系显然破坏了乡村自组织建设的自然过程,在城市经济文化不断扩张造成的乡村传统价值不断削弱的背景下,人们不由得感叹乡村的变化正是一种乡村环境的城市化。各路设计人员以“城里人”的身份悄然化为乡建主体,凭借自身的主观臆断,关注到的仅仅是乡村现有和未来的“现世价值”,并未从农民真实的生活情境出发,对乡村的发展与未来进行深度思考。由此可见,千篇一律的模式化设计陈述手段往往无法摆脱乡村建设面临的各种复杂困境。乡村设计因其滞后性,极大受制于先入为主的现代城市设计的理念与手段,不可避免地在设计陈述的实质与形式上产生了偏见。

乡村设计陈述的实质偏见:设计的实质偏见表现在设计的社会态度与心理态度中的直觉偏见。长期以来,在城市主导乡村的不平衡发展战略中,大众认知往往从态度和心理上轻视甚至批判乡村的种种价值^[13]。设计师借各种缘由,如落伍的村民观念、缺失的基础设施、松散的乡村组织、低效的农业等,将乡村命定为“差一点的低等级城市”,且以“救赎心态”萌生出新的“不公平”与布迪厄“区隔”般的偏见。这类虚假的主张带有不自知的优越感,导致设计极易以一种傲慢的姿态介入乡村,并破坏乡村在空间结构中原本所具有的乡土人伦意识。同时,面对强势的城市主义、理性主义的盛行,乡村自身主体性意识逐渐瓦解,设计陈述传递出的更多的是对乡村主体性的漠视态度。归根结底,这类偏见根源在于人们将城市文明、工业文明过于标签化地高于乡村文明,缺乏对乡村价值体系的认知。而只有建立对乡村价值的正确认知,设计才能从态度上摒除偏见,否则这种寄生于城市主义的设计偏见在乡村将继续无度蔓延下去。

乡村设计陈述的形式偏见:这类偏见源于乡村设计理论体系的缺失和对设计陈述语

境多样性的忽视。目前乡村建设中盛行的两类设计陈述方向:一味修旧如旧与盲目拆旧布新。前者在迎合城市人对乡村虚设的审美想象时,偏执地拒绝了村民对现代健康生活方式的合理诉求;后者则忽视了乡村景观空间格局与传统伦理文化、绿色生活方式、乡村自治组织结构等的紧密关联与不可分割性,所设计的场景被认为是脱离地域文脉的失范^[14]。现有的乡村设计实践往往容易片面地重有形的物体的建构,轻无形的乡村精神价值的塑造与地方知识体系的学习,而将乡村设计的所有陈述都归类到一种宽泛、折衷的范畴,甚至刻意对乡土营造中的精神符号等显现与潜在层面的表达进行选择性的压制。这些符号范畴涉及如宗族意识、风水观念、布局、结构、装饰构造等传统乡村造物中的“文本”与“词汇”,一旦这些符号内容在设计实操层面被当成主要的经验材料并被简化,设计所陈述的结果就不仅暴露出设计形式的模糊性与浅表性取向,掩盖了乡村原本生产生活性景观的丰富精微的内涵,也进一步加剧了乡村设计中“假古董”的盛行。

四、结 语

希尔德·海嫩(Hilde Heynen)指出:“现代性的经验包含了一种与传统的断裂,是对于生活方式和日常习性的深刻冲击。”借用海嫩的这个观点,透过乡村设计发展脉络可以发现乡村设计既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也是一个现代性的过程。无论是发生在乡村设计表象中的“中”与“西”设计语言冲突、“新”与“旧”价值转变危机,抑或是面对现代化、全球化的同化语境所做出的一系列地方化的行动抵抗,都可以看成是现代乡村设计中全新的设计诉求对传统造物观念的一种突破。尽管人们已经明白,中国乡村设计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本土设计的“现代化”,但从整体社会文化认知的观点体察,还不免有些许令人失望的地方。尤其是中国本土乡村设计在新与旧、中与西的多元语境中摸索前行,难以找到自身特殊的、历史的设计方向。因

此,对乡村设计历史脉络进行理论索引,从历史的逻辑出发来揭示乡村设计的现代性特征,这既是对当前乡村设计在现代性的历史断裂方面的反思,也启发人们应理解、包容乡村在设计现代性发展过程中所遭遇的诸多偏差因素,以一种更加自信的文化姿态迈入未来乡村设计的中国式现代化之路。

参考文献:

- [1] 艾格纳,孙志健. 抵抗的地域:批判地域主义的批判[J]. 装饰,2021(11):55-65.
- [2]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乡土再造:乡村振兴实践与探索[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8.
- [3] 沈榆. 中国现代设计观念史[M]. 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17.
- [4] 曹小鸥. 中国现代设计思想:生活、启蒙、变迁[M]. 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2018.
- [5]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 当代中国的乡村建设[M].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20.
- [6] 王南杰. 全球化语境下本土艺术特质的再发现:从现代设计出发观照民间美术中的隐性知识[J].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20(3):74-77.
- [7] 吉登斯.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 [8] 杨佳西,张杰.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环境设计同质化问题及应对策略[J]. 中国集体经济,2021(26):13-14.
- [9] 曹帅,许开轶. 逆全球化浪潮下“全球风险社会”的治理困境与中国方案[J]. 理论探索,2018(6):69-74.
- [10] 赵狄娜,阮仪三. 保护古村,留住乡愁[J]. 小康,2023(15):26-28.
- [11] 威廉斯. 乡村与城市[M]. 韩子满,刘戈,徐珊珊,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 [12] 汪勇政,邹慧君,余浩然. 安徽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转型互动关系研究[J]. 沈阳建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5(1):50-57.
- [13] 吴文治,郭林娜,汪瑞霞. 中国乡村设计的主体间性与价值判断[J]. 民族艺术研究,2023,36(1):126-135.
- [14] 吴青熹. 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与乡土伦理的重建[J]. 伦理学研究,2021(6):127-133.

Historical Context and Dynamic Consideration of Rural Modern Design

ZHANG Jiaxin, MEI Zhiyue

(School of Design Art, Changsh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angsha 410114, China)

Abstract: The process of Chinese rural design has experienced the collision and reconcili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design consciousness, the value opposition between globa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and then the self-identity writing under the different local relations. It can be said that Chinese rural design has presented a kind of flowing modern consciousness from beginning to end, and this modern consciousness is accompanied by Chinese rural design practice. By sorting out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rural design, the emergence of modernity consciousness can be explored, and the countryside design through designing reform in the time linearity can be well understood and grasped.

Key words: rural design; modernity; modernization; localization; design ethics

(责任编辑:高 旭 英文审校:林 昊)

(上接第 19 页)

The Updating Strategy of Material Space Interface in Historic Urban Area of Shouxian Coun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Heritage

LIU Renyi^{1,2}, ZHANG Xiaoyan^{1,2}

(1. School of Architecture & Urban Planning, Anhui Jianzhu University, Hefei 230601, China; 2. Key Laboratory of Huizhou Architecture in Anhui Province, Anhui Jianzhu University, Hefei 230601, China)

Abstract: Space interface is an important window to express regional culture and an important part to extend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city.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construction, the historical space interface has been damaged more and more seriously. As one of the first national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ities in Anhui Province, Shouxian County is the hometown of Chu culture. Its historical urban area is currently in the predicament of insufficient cultural excavation of material space interface, fractured context and low spatial vita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text inheritance, this paper summarizes and collates the elements of material interface space, analyzes its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and studies the improvement strategy of its material space interface style, so as to reduce "distortion" and "frustration" and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preservation and inheritance of historical culture and the creation of contemporary regional architecture.

Key words: Shouxian County; cultural inheritance; space interface; streets and alleys; courtyard

(责任编辑:高 旭 英文审校:林 昊)